

战 国 卷

陆建芳 主编



欧阳摩壹 著

# 中国 玉器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

战 国 卷

---

欧阳摩壹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 战国卷 / 陆建芳主编; 欧阳摩壹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842-6

I. ①中… II. ①陆… ②欧… III. ①古玉器—文化  
史—中国—战国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9523号

**中国玉器通史·战国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ZHANGUOJU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28)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65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330.00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sup>[1]</sup>，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sup>〔1〕</sup>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sup>【1】</sup>。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珪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sup>【1】</sup>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sup>【1】</sup>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别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浊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公元前 770 年，由于獯豸的侵袭，周平王由关中的丰镐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史称“东周”。历史的巨河，仿佛解除了商周森严礼制的束缚，奔腾向前，展现出一幅幅波澜壮阔、变化万端的历史画卷。

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初步确立，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又归于统一的过程。其时，周王室衰微，诸侯割据，竞相争霸；到了战国，七国争雄，为了兼并土地互相征战争雄，不义之战打得无止无休。连年的战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力，但也打破了旧有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周天子“唯王独尊”的威严及森严的宗法制和礼乐制，消除了封建经济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封建经济在各大封区内，获得自由而广泛的发展，为以后全国统一和封建社会的确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战国时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都有重大发展和深刻变化。由于连年战争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造成井田制度被破坏，土地重新分配；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农业税制的实施，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得到较大发展，数口之家的小农经济得以成长，并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级——地主阶级，这些成为新兴的封建经济和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

在政治方面，各国有作为的君主，励精图治，先后进行各种变法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组织，颁布、执行了制定的法律和度量衡制，使各国的国力大增，并使列国的政治结构和律令措施趋向一致。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学术、艺术的繁荣。各国为了进行变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纷纷招徕英才，杰出人才常常得到国君的尊重或重用。因此从师游学和谋士游说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门径，讲学、著书立说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客观上促进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兴盛，进入历史上空前的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的高潮期。

分裂的政治局面，却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艺术领域所展现的百花齐放的新格局，为各种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促使传统工艺技术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大力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铸铜、制玉、漆木、建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时代风格的杰出的创新之作，其中起领军作用的是当时列国诸侯兴办的官办手工业。

东周时，在频繁战争状态下，列国诸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自身的安全，自春秋中叶起，大兴筑城。当时除周王城外，许多城邑设置官府手工业作坊，集中力量生产战争所急需的兵器，及高级贵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必备的青铜器（图引-1）、玉器、其他奢华用品。从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勘察、发掘出土的铸铜、制玉作坊遗址，说明当时统治者对制作的青铜礼乐器、兵器和玉器（图引-2）是多么的重视。王室贵族间的礼尚往来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祭祀活动，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商贸上的互通有无。列国都城设市，更可以促进王都这种中心城市的商业繁荣。玉料、珠宝、金银、皮革等很自然地被迫逐利润的商人从边远地区运到市场出售，以供王室、官僚、贵族等上层人物享用，正如《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所说“商不出则三宝绝”。而经济、文化交流和商业繁兴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各类手工业的发展。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在手工业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琢玉业进一步发展，以其杰出的表现和重大的突破，在中国玉器史上写下辉煌华美的不朽篇章。



图引-1 蟠龙纹方壶

高 64.7 厘米、腹宽 34.5 厘米  
河南省辉县琉璃图甲墓出土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图引-2 龙形玉佩

长 4.8 厘米、孔径 2.6 厘米、宽 7.6 厘米、厚 0.4 厘米  
河南省辉县琉璃图甲墓出土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中国独具特色的玉文化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初步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其时，出现了大量非实用性的宗教用玉和政治性用玉，玉器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而成为沟通人与神的媒介物和等级权力的象征物。随着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以及礼仪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深化，商和西周玉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礼仪化用玉日益加强，礼玉不仅继续承担着沟通天地鬼神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成为贵族阶层显示身份地位甚至是王权的信物。玉器也逐渐由新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的祀神，发展到为奴隶社会服务的祀礼，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

东周时期，社会的大动荡和政治变革，促使奴隶制社会逐渐崩溃，旧礼仪也日益衰亡，加之科技进步，人性解放，尤其是战国以后，铁工具的使用，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包括玉器业在内的手工业的发展与创新。当时庄重肃穆的玉质礼器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和神圣的地位，礼玉日渐衰落；玉器的制作，突破了早期文化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社会功能，从此开始了对美的有意识的追求；玉器的功能也由娱神逐渐转移到娱人，由为神服务转变成为人服务。东周特别是战国玉器不仅数量大、装饰性强，而且造型规整、图纹华丽、工艺精湛，无论造型纹



饰、工艺技术及时代风格都为之一新，体现了战国时期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意气昂扬的精神风貌。

春秋时期玉器数量较多，其品类、装饰技法在继承西周玉器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和变化。和田玉已经大量出现。随着西周礼乐、宗法制度的崩溃，作为集祭祀、礼神与权力为一体的玉质礼仪用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礼玉功能减弱，祭祀礼仪意义则显得较为淡薄。琮、璧、圭、璋等仍在继续制作，但工具、武器类玉器已很少见。玉器由以礼仪用玉为主，开始向生活装饰用玉发展。玉器品类日益增加，出现了实用性质的带钩和装饰镶嵌用的玉剑饰、玉柄饰、异形饰件等。随身佩戴的玉饰比较流行，有璜、玦、镯、环、串饰、佩、觿（图引-3）、鞞、冲牙（图引-4）等多种，其中成套的组佩更为盛行。当时的佩玉也冲破了西周时贵族礼仪制度的束缚，不但在形式上从颈上佩戴改为腰间悬挂，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开创了以玉喻德的先河。



图引-3 玉觿  
长 6.6 厘米、宽 0.7 厘米  
河南省辉县琉璃图甲墓出土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图引-4 玉冲牙  
长 9.2 厘米、宽 1.8 厘米、厚 0.6 厘米  
河南省辉县琉璃图甲墓出土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春秋时有纹饰的玉器数量大增，多见云纹、蟠虺纹、兽面纹等，纹饰细密繁缛，常以多层次的浮雕、线刻等造成华美的效果，排列规整，繁而不俗，可见雕刻技术已相当娴熟。春秋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画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缠绕的龙纹图样，且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春秋中期以后，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浅浮雕技法